

中国语境中的社会公德建构

王晓丽 巫茜子*

〔摘要〕 在中国语境中,公德概念是宏观国家之德和微观公民之德的有机统一,立足于实践以国家之德“引渡”公众之德是实现两者统一的逻辑路径。宏观公德体现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微观公德体现出社会的文明程度,两者的关系经历了“混沌一体”“分化发展”“有机统一”三个发展阶段,公德的内容由强调“齐一性”向注重“层次性”转变。真正落实公德两层面内容的有机统一是未来中国语境中公德研究的重点问题,也是中国公德建设方案形成的关键之笔。

〔关键词〕 中国语境 社会公德逻辑 社会公德内容 社会公德特征

〔中图分类号〕B8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20)03-0091-06

DOI:10.13904/j.cnki.1007-1539.2020.03.012

在中国语境中,社会公德是一个人人认为重要,却始终未形成持续规模化研究的问题。未形成持续规模化研究的原因是它本身挟裹着太多民族文化的基因,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处在以模仿西方研究范式、评价标准、话语体系为主的初级发展阶段,它注定无法引发学者们的集体关注。社会公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标识着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它以“开新民,兴中华”为己任的姿态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其间历经时代变迁,但其使命却始终未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以总结经验,建构中国特色研究范式、评价标准、话语体系为主的发展阶段,中国语境中的社会公德逻辑建构、内容建构、特色总结成为时代诉求。

一、中国语境中社会公德的逻辑建构

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中国的文化先驱们在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进程中聚焦到公德改变中

国人精神状态的价值,说明其内容和存在依据。

关于公德的概念,学者们在梁启超的论述上达成一致。宏观上,公德是国家之德。“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1〕(180)}“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也……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2〕(4994)}公德是引领国民为国家奉献的价值追求,是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

微观上,公德与私德对应,不同于处理个人关系的私德,公德是处理个人与群体关系的道德规范。梁启超强调:“德之所由起,起于人与人之有交涉……故无论泰东泰西之所谓道德,皆谓其有赞于公安公益者云尔;其所谓不德,皆谓其有戕于公安公益云尔。”^{〔3〕(26)}公德是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道德规范,强调为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做出贡献。

* 作者简介:王晓丽,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640);巫茜子,广东培正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广东广州 5108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KS105);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DXM101)。

总体上看,梁启超一方面把公德与美好生活的政治理想联系起来,强调公德是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标的全民族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把公德框定为在个人与他人、群体的交往中,为他人和社会做贡献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契合,公德建构中宏观层面的内容成为公德建构的重点。之后,文化先驱们继承和发展了梁启超的公德思想,一方面找到了公德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探寻到打通公德宏观和微观内容的方法,形成了公德建设的中国逻辑。

公德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探索经历了抽象人性论、进化人性论、实践人性论三个发展阶段,这一过程始于陈独秀,发展于李大钊,完成于中国革命实践。

第一,公德建构的个体始基。陈独秀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路,以人性说明公德在个体身上存在的依据:“道德问题……根于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的相爱、互动、同情心、利他心、公共心等道德……这是人类普遍的现象,各民族都是一样的,却不限于东洋、西洋。”^{[4](85)}与陈独秀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想结合起来考察^①,利他心是公德的核心内容。李大钊以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明公德在个体身上存在的合法性,“道德就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之社会的本能”^{[5](260)},道德与“保存种族繁殖”出于同一根源,这就意味着“自己保存”“种族繁殖”是个人道德。同时,李大钊开始强调道德的发展性,为道德以抽象人性论为依据走向以社会实践为依据奠定了基础。李大钊关于公德的论述的不足之处在于仍带有抽象人性论的痕迹^②,这一公德起点处的局限性随着文化先驱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更为科学化的理解而得到克服。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进化论也和封建主义思想武器

一样软弱得很,一旦碰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就直接宣告破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文化先驱们对公德的认知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6](1513-1514)}

第二,公德建构的社会始基。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说明公德存在和发展的社会依据:“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变动。”^{[5](272)}立足于时代,既然一战后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生活,那么我们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世界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5](273)}。毛泽东与李大钊观点相同:“由是观之,则夫时代既异,而道德亦不能不随之以异,不特其理至明,而其证亦至确也。惟道德何以必随时代而不同,既已随时代而不同,而又何以仍无失其为道德,此则虽圣哲犹难言之……更进而论之,则虽一民族中之各社会、各人,亦不免各有其特别之道德。”^{[7](112)}在各段话旁边,毛泽东批注为“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7](112)},强调社会发展对道德的决定作用。

第三,公德内容一体化的逻辑建构。关于公德两层面的内容如何统一的问题,李大钊以国家之德“引渡”公众之德的方法给出了答案。李大钊认为:“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人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5](228)}依据此种逻辑,公德(即宏观公德)以国家理想的形式被引入到现实生活中成为个人行为道德评价标准(即微观公德),个体行为按照国家的要求被模塑,个体完全被湮没在国家

^① 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陈独秀认为:“个人之在社会,好像细胞之在人身,生灭无常,新陈代谢,本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恐怖。”(陈独秀:《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科学家说人死没有灵魂,生时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这几句话倒难以驳他。但是我们个人虽是必死的,全民族是不容易死的,全人类更是容易死的了。全民族全人类所创的文明事业,留在世界上,写在历史上,传到后代,这不是我们死后连续的记忆和知觉吗?”(陈独秀:《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虽然陈独秀强调个人人格自由,但是当他讲到人生意义时,却认为个人还是要服从社会。

^② 关于人性论,毛泽东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的是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

中,公德两个层面的内容自上而下实现统一。

至此,中国语境中公德的逻辑建构基本完成,公德以实现美好生活为价值追求,以塑造崇高品质为己任,通过将国家价值追求确定为个人崇高品质的道德标准实现两层面内容的统一。20世纪初建构起来的中国公德运行逻辑一直伴随着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不断发展,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公德内容体系。

二、中国语境中社会公德的内容建构

与公德运行逻辑一致,公德内容建构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展开。同时,作为上层建筑,公德两个层面的内容及其结合方式都随时代主题而变迁,不断彰显出时代特性。

(一)站起来阶段:公德混沌一体发展

站起来阶段实质上就是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亚病夫”形象,“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8](1030)}的阶段。与此阶段历史主题相契合,公德宏观层面的内容是彰显“国家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价值观和道德原则;微观层面的内容则强调体现国家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公众道德规范。公德内容在1949年制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被确立并颁布实施。

《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9},日常生活中人们简称“五爱”。“五爱”确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革命成果、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之际,公德起源处的政治伦理内容和社会伦理内容天然统一且作为国家的纲领性内容被固定下来,成为之后国家道德建设的总纲。徐特立在《人民教育》上用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对国民公德进行了系统说明。徐老指出,“爱祖国”是最高的、第一位的公德,爱祖国的内容是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完成革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是爱国的时代内容,每个国民爱国就是要为国家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10]。“爱人民”就是国家保证人民的政权、财权、人权,使农

民获得土地,工人有工做,公教人员有事做,私人企业有利可图,而人民就是要通过他育和自育提高思想觉悟,为政治活动和经济建设服务。“爱劳动”主要是指劳力者和劳心者改变旧的错误劳动观念,树立劳动光荣、热爱劳动的观念,遵守劳动纪律。^[11]“爱科学”简单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历史的考验、群众的考验和自己的考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爱护公共财物”就是要求人民通过努力生产、履行节约、反对一切浪费,来实现我国的原始积累。^[12]总体上看,“五爱”是公德建设的总纲,是在公德价值观层面提出公德的总要求,体现出中国公德的特殊性,即个人为国家革命和建设奉献的精神要求,它奠定了中国公德建设的未来发展路向。

“站起来”阶段公德建设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属于宏观层面的公德,即国家之德。在“五爱”中,从字面上看仅有“爱护公共财物”体现出微观公德的性质,但细究后发现此阶段的“公共财物”是指国家的财物,“爱护公共财物”就是爱护国家财产,这与改革开放后公共领域中以公共福利为内涵的“公共财物”在语义上有较大差距,其实质仍旧是宏观公德范畴。公德建设中强调宏观层面的内容,体现了“站起来”阶段国家发展的时代诉求,有其建设的客观合理性。

(二)富起来阶段:公德分化发展

富起来阶段是指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13]。此阶段,公德建设进入迅猛分化发展的阶段,宏观内容演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微观层面构建出公民道德体系。公德两个层面的内容各自在其轨道上丰富发展,受到西方学术研究的影响,学者们在“公德仅指微观意义上的公民道德”的观点上达成共识。

首先,国家之德建设经历了由“精神文明”语境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语境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最先提出“精神文明”概念,作为与物质文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14](435)}是其主要内容。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精神文明包括道德建

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方面的内容。改革开放后,精神文明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明确了起源处公德的性质为精神文明;另一方面明确了起源处公德的内容分为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维度。两个“明确”标志着公德建构开始朝着科学化、精准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社会领域分化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公德建设的新语境。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5](13)},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的明晰化初步形成。胡锦涛在2003年提出了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为核心内容的“和谐文化”概念^{[16](67)}。之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同时大会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强调了其全民精神纽带的价值。2008年胡锦涛在“6.25”重要讲话中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公德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另一方面推进了公德内容的科学化发展,即远大理想、共同理想、中国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有机统一。

其次,伴随社会领域的分化,公德微观层面的内容建设也迅猛发展。在精神文明建设语境中,公德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与职业道德并列的一个领域概念^{[14](440)}。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领域公共道德的具体规范雏形,说明社会公德包括人道主义、社会秩序、社会文明、社会奉献等内容。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再次把社会公德与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并列起来,强调其领域道德的性质,且把社会公德的内容固定为“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18](112-113)}。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社会公德概念有了统一界定:“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

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19](5)}从十二届六中全会到《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社会公德微观层面的内容被清晰科学地确定下来。

“富起来”阶段的公德建设呈现了公德两个层面内容各自发展的态势,具体到公众的认同,公德更多是指公民道德,起点处的国家之德基本上指国家的政治理想。起点处实现公德两层面对应的“引渡”方法因为现实生活中经济成分多样、分配方式多样等客观事实而效果式微。

(三)强起来阶段:公德内容有机统一发展

强起来阶段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8]的时代。与强起来时代主题相契合,公德建设进入强发展阶段,实现了公德两个层面分化基础上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的公德内容体系初步建成。

首先,公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境生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首次提出,并且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至此,经过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不断深化,公德建设进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境。

其次,公德内容建构开启分化基础上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预示着公德宏观与微观分裂发展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真正地实现了公德两个层面内容的有机统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与北大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行了集中说明:“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它“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

值要求融为一体”^{[20](168-173)}。公德建设宏观与微观内容分化基础上的有机统一发展阶段自此起步,公德建构的中国特色基本形成。

不同于西方语境中公德仅指公共生活领域中道德的情况,中国语境中的公德是宏观“大德”与微观“公德”的有机统一。公德两层面内容间的关系以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界标,分为“混沌一体”“分化发展”和“有机统一”三个发展阶段,三个阶段的公德发展历程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程的反映,也是其取得的实践成果。公德“两层面”的内容结构和“三阶段”的发展历程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以集体主义为道德原则的社会主义公德建设形成的特有经验,它不同于西方唯心主义历史观指导下以个人主义为道德原则的单一化公德建设发展模式。

三、中国语境中社会公德的特征

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社会公德在逻辑建构、发展道路和内容建构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公德建构从“混沌一体”到“有机统一”

首先,公德的“否定之否定”发展道路。以公德主体的变化为依据,中国公德建设先后经历了“国家公众之德混沌一体”“国家公众之德并行发展”“国家公众之德有机统一”三个阶段。第一次转折的关节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中国语境中的公德主体指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公德”到改革开放(具体为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公德中的“公”涵盖了未分化的国家和公众,“公德”就是混沌一体的国家和公众之德。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始,公德的国家之德与公众之德开始分化,国家之德的内容先后经历了“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个发展时段,最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式被确立下来;公众之德的内容从开始的附属地位到逐渐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最终生发出公民道德概念,表达了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大众道德、公众道德之意。第二个关节点是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强调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大德”又是“小德”,使分化后的国家之德和公众之德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实现了有机统一。

其次,公德内容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统一。与古希腊、古罗马发端处就强调公民参与的西方文化不同,自古强调家国一体的中国在家、国之间不存在制约国家政治的公共领域。西方16世纪起的工业化进程把传统的公共领域固化为社会,也称作“第三部门”,它最突出的功能就是形成公意,参与国家政治。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有两大功能:一是公众形成公共意见的场域;二是在日常生活和国家之间存在的社会,它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21](4)}。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领域不断发育、扩大、巩固,但它并不具有形成公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功能,而仅仅是纯粹的公民活动领域。中国语境中的“公共”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国家、集体,二是指公众。当然,只要有公共活动必然形成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一是指国家利益,即国家为保障公共领域的顺利运转而提供的公共物质服务和精神服务;二是指公众利益,即为保障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形成的契约型原则和规范。社会公德就是公民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应有的公共精神、应该遵循的原则和规范以及在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德性。那么中国缺乏西方语境中公德的政治伦理含义吗?梁启超所提出的公德内涵中的宏观政治伦理内容丢失了吗?事实并不是这样。公德中政治伦理的内容在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从公德的原初含义中独立出来,经历了“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大语境转换,形成了较完善的国家层面之公德的内容,对应着西方语境中公德的政治伦理含义,延续了梁启超语境中的宏观政治伦理内容。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大德”与“小德”的有机统一,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自独立发展的公德两个层面的内容再次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国公德内容建设的宏观与微观有机统一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是由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德内容建设之路。

(二)公德要求由强化“齐一性”转变为允许“层次性”

“五爱”作为社会主义公德的最早形态,无论是《共同纲领》中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还是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都体现了国家对国民的齐一化的高道德要求,即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按照统一的共产党员道德标准规约自己的行为。这反映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作为唯一经济成分的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阶段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要求。这是中国公德建构处逻辑惯性演化的结果,以国家的道德理想作为个人行为善恶的评价标准,把个人完全融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兴起且在公众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公德成为一个与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并存的领域道德。“五爱”转化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的“大德”和以公民道德为内容的“公德”的有机统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达,每一项具体内容都针对不同对象、包含不同层次的要求,形成了“大德”内容的层次性。“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是贯彻“大德”精神到具体的公共生活领域的重要体现。社会公德规范出现层次性特征,设置“有所守”的道德底线和“有所为”的道德追求,由低到高有机统一的社会公德体系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本质要求。

新时代公德中的“公”一方面是指国家,公德就是国家之德;另一方面是指公共生活领域,公德就是公共领域中的公民之德。第一方面的公德内容形成于20世纪初实现“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之际,第二方面的公德内容发端于20世纪初,勃兴于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带来的公共生活领域的迅猛发展时期。公德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由最初的混沌一体,经过各自发展,再到有机统一,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公德建设之路。具

有中国风格的有机统一的公德体系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有效作用,为世界道德建设提供中国支持,为发展中国家道德建设提供中国借鉴,是中国语境中公德研究的未来走向。

参考文献

- [1]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影印本.
- [3] 梁启超.新民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4] 陈独秀.陈独秀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 [5]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0] 徐特立.论国民公德(上)[J].人民教育,1950,(5).
- [11] 徐特立.论国民公德(中)[J].人民教育,1950,(5).
- [12] 徐特立.论国民公德(下)[J].人民教育,1950,(5).
- [13]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 [14] 胡耀邦.胡耀邦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
- [16]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7] 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06-26.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9]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百问百答》编写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百问百答[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 [2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 [21]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陈 菊